

跨世纪文丛

6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李辉
著

太阳下的 蜡烛



UASHIJI
WENCONG

太阳下的 蜡烛

李
辉
著

金中田 晏 敏 宋 吉 蔡 王 回 顾
平 斌 潮 强 泰 同 服 策
袁 楚 利 继 主

并献出艺文工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下的蜡烛/李 辉著

(跨世纪文丛;第 6 辑/陈骏涛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

ISBN 7-5354-1900-3

I. 太…

II. 李…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7418 号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公安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125 插页:2

版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1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54-1900-3/I·1458 定价:15.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副刊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沧桑看云》、《李辉文集》五卷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切实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沧桑看云

摇荡的秋千

——关于周扬的随想	(3)
-----------------	-----

风落谁家？

——关于姚文元的随想	(13)
------------------	------

太阳下的蜡烛

——关于郭沫若的随想	(31)
------------------	------

碑石

——关于吴晗的随想	(46)
-----------------	------

困惑

——关于梁思成的随想	(72)
------------------	------

鹤

——关于聂绀弩的随想	(95)
------------------	------

残缺的窗栏板

——关于红卫兵和知青的随想	(111)
---------------------	-------

陈迹残影

悲怆北大荒

——黄苗子和他的家书	(133)
思想者永不寂寞	
——孙越生印象	(146)
漂泊梦之谷	
——萧乾和他的《痕迹》	(159)
解冻时节	
——贾植芳和他的家书	(172)
陪都迷离处	
——冯亦代和他的重庆日记	(183)
走在这个世界上	
——《黄永玉画集》序	(194)
话语空间	
面对“五四”	
——与王元化谈历史反思的思维模式与方法	(209)
镜子中的历史	
——与蓝英年谈苏俄政治文化与中国	(236)
走进历史的深处	
——关于现代文人的描述	(265)
一棵结出苦果的怪树	
——关于左翼文坛宗派主义的随感	(288)
笔下春秋写信史	
——读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302)
漫步瑞典	
高墙里的画廊	
——瑞典监狱印象	(313)
酒鬼	(329)

墓地.....	(335)
微笑中的音乐.....	(341)
在传统与自然中漫步	
——瑞典耶夫勒纪行.....	(347)

跋：世纪风雨中的寻觅与追踪

——与李辉对话..... 孙小宁(369)

附录：李辉主要作品目录	(376)
-------------------	-------

沧 桑 看 云

摇荡的秋千

——关于周扬的随想

一九八九年九月五日，是周扬的追悼会。那天，八宝山几乎成了一个社会舞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政见的人，对死者有着不同认识不同关系的人，都为同一个人默哀，虽然各自心情不同。在我的有限经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人的追悼会，能像他的追悼会这样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同时负载着众多难以解析的矛盾。

就政治规格而言，追悼会的重要性已达到一个文化人所能获得的极致；就文化意义而言，追悼会的兼容性同样达到极致。倘若死者灵魂有知，不知会是怎样感觉？政治上的重要性和文化上的魅力，不就是他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吗？两者在他死后，居然同时来到灵前。

然而，当伫立在飘荡的挽联面前，我又感觉到这突然而至的荣光，却隐含着几丝悲凉。因为对于周扬来说，这荣光的代价是人生走至终点时最后的痛苦、寂寞、苦闷乃至精神死亡。同时，它的降临，又是因一个巨大的历史变故而促成。就是那些纷沓而至的文化人，也并非完全为了一个个人而来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善良的宽容，他们不再苛求死者，也不

回望昔日的风风雨雨，只是看重死者生前短暂却又难能可贵的心灵闪光。他们不是历史学者，不需要冷静和严厉，不需要去对历史人物做判断。

在一刹那间，我仿佛觉得这个追悼会所表现出来的重要性和兼容性，对于周扬的一生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是否可以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他人生的双重意义，即：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两者深藏于他的内心，决定着他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它们天生地纠缠在一起，生生灭灭，互消互长。在漫长的岁月里，和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献身于一种革命事业，但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是在这两者的拥抱、排斥、搏斗中得以完成。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内心，两者或许有过短暂的统一，更多的时候则是矛盾的。内心的矛盾，就决定了行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甚至产生出异化的力量，改变或扭曲他的人格。从而在人们的眼里，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这两者的矛盾存在，制约着他的一切选择，决定着他的善与恶的挥洒。在仕途上，他仿佛坐在一个从未停止摇荡的秋千上面，荡来荡去，性格的悲剧也就因此而产生，因此而无法避免。

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心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把周扬作为我未来笔下的一个传记人物去研究。然而，几年过去了，我采访了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但是，关于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这的确是一个难以描述的人物。在我看来，他的复杂他的难度，远远大于我以往所描述过的任何人物，如巴金、萧乾、胡风、沈从文等。他们也是有着复杂的精神世界的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反映出内心的影子，他们的生存环境，往往容易捕捉和理解。周扬却不然，他留给我们的诸多公文和报

告，很难让人从中窥探到他内心的变化。实际上，在延安之后的许多时间里，他的自我已经消失在报告的后面，人们只能从历史风云的变化中看出他自己生活的蛛丝马迹。

虽然如此，我仍然感受到这个历史人物对我的诱惑。他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作为左翼文化一段历史的代表人物，对他的悲剧的解剖，其意义是很多与他同时代的文人所无法取代的。不仅仅他，二十世纪的中国，仍有许多重要的人物没有被认真地客观地描述。而对他们的研究，必将大大丰富我们对这个即将结束的世纪的认识，同时，也就会大大加深对知识分子本身的认识。（例如，胡乔木就是十分有代表性的一个。他的特殊复杂的内心精神世界，至少不亚于周扬。）

因此，最终能否写出一本周扬的传记，我依然没有把握，但是，作为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历史人物，他不会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仕途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国度，对于个人总是有一种消融性。当醉心于理想而投身于仕途之后，他不能不在个性与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为适应政治需要而改变自我，或者因保持自我而被政治所淹没。政治家是否一定都如此，尚且不论，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往往无法避免。

在政治家中，毛泽东也许是个例外。在我看来，他的伟大之一就在于他没有因政治而压抑自我，没有让个性消融在革命之中，相反，他的个性在最大限度上决定了革命，决定了政治的推进。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在他的照射下，所有崇拜他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我置放到微不足道的位置。随他思考而思考，随他呼吸而呼吸。

周扬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仕途，是与对毛泽东的崇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上海到达延安后，与鲁迅的矛盾，可

以说一度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周扬身上。然而，随着“鲁艺”在毛泽东心目中地位的上升，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周扬一下子摆脱了困境，从而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诠释者，这就奠定了他日后成为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的基础。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一方面高度评价鲁迅，一方面又能信任曾与鲁迅格格不入的周扬，而不是重用与鲁迅保持友好关系的冯雪峰，这的确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在这方面，起关键作用的是毛泽东的个人兴趣，还是周扬的个性表现？是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话题。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延安对于周扬是人生的最主要的转折点。一个崭新意义的周扬，一个在仕途上昂首前进的周扬，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人们的记忆里，三十年代初，刚从日本回来的年轻周扬，潇洒倜傥，穿西服，系领带，着皮鞋。他爱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与朋友谈笑风生。他投身革命，同时也是文艺家中的一员，对艺术有见解和感悟。这时的他，自由地挥洒着个性，让人感到亲切、可爱。

当几年后国统区的朋友重新见到他时，发现他的性格已不同于从前。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谈笑风生，而是不苟言笑。过去本来能够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却感到了他的陌生。到一九四九年之后，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他是文艺界领导，却很少参加文艺家的自由聚会，他是在主席台上在报告中在报纸上，同大家见面。有的人甚至说，他没有一个真正可以谈心的朋友。人们尊敬他，敬畏他，却没有了亲切。

不知道周扬本人是否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种变化，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向他暗示过这种变化，不管怎么说，他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化人，而是仕途上的文化人。矛盾由此而产生。仕